

今天,文脉君和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
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(G20)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10日落幕。媒体注意到,印度总理莫迪9日在峰会上发表演讲,其身前桌签上的国家英文名写着“BHARAT”(译为“婆罗多”),而不是“INDIA”。此前,印度在向各国领导人发出的峰会晚宴邀请函中,印度总统穆尔穆的称呼也是“婆罗多总统”。这些细节传达出印度想要更改国名的“强烈信号”。

“婆罗多”到底是什么意思?简单说来,“婆罗多”是南亚次大陆多种语言中对印度的称呼,词根来源众说纷纭,但多绕不开三本来自印度的古典名著——《梨俱吠陀》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往世书》。

鲜为人知的是,这三本书跟江苏文脉或多或少有一些联结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王子扬 刘静妍



《梨俱吠陀》精读》书影



《摩诃婆罗多》书影



《博伽梵往世书》书影

# “婆罗多”和江苏的缘分 要从1600年前说起

## 两位“猴王”

### 淮安人吴承恩认不认识哈奴曼

先聊聊《梨俱吠陀》。

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,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河两岸和五河地带,开启了印度文明上的“吠陀时代”。

他们的诗人、歌者创造出了大量讴歌自然和赞颂神祇的作品。而后有人将这些诗歌加工整理,编纂成书,命名《梨俱吠陀》。

“梨俱”是光辉的意思,“吠陀”有“知识”“启示”的含义,全书有如一本上古印度的百科全书。

有意思的是,天神因陀罗在与妻子的对话中,提到了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。

这极可能就是印度神话中家喻户晓的“猴王”哈奴曼的原型。

哈奴曼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本领:

比如,他从摩亨德拉山顶一跳,可以飞越大陆与楞伽岛之间的海峡,堪称“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”。

比如,他也可以随意变化身形,像在潜入魔王罗刹那的宫殿时,他就变成了狸猫。好似有“七十二般变化”。

再比如,有个妖精将他吞到了肚子里,他变小变大,几乎要撑破妖精的肚子……对了,妖精的名头也不陌生,叫“罗刹女”。

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想到了,这个哈奴曼怎么跟我们的孙悟空这么相像呢?

16世纪,明朝淮安人吴承恩在写小说时,是否受到了印度神话的影响?这在学术界一直有各种看法。

胡适是这个说法的坚定支持者:“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。”他大胆假设:“中国同印度有了1000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,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,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。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。”



陈奕禧题《西游记图册》



印度电视剧《摩诃婆罗多》

## 1600载

### 天竺大德,苏州寺庙

《摩诃婆罗多》谈的是英雄、美人、爱情、复仇、王位的继承、宫廷的阴谋等等。

这本书里很多文学原型都在佛学经论的翻译过程中逐步来到了中国。

据《江苏文库·研究编》中的《南朝佛教与文学》提到,约1600年前,姚秦时期的佛教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在翻译《大庄严经论》时,就介绍过《摩诃婆罗多》:

“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,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《罗摩延书》又《婆罗他书》,说阵战死者,命终生天。”

更有意思的是,我们有理由相信,当时已经有不止一个江苏人听过“婆罗多”这个说法了。

鸠摩罗什的弟子们,足迹遍布江南地区,推动了佛教在江南的传播。

东晋、南朝时期,高僧竺道生俗姓魏,幼年从竺法汰出家,具戒后隐居庐山七年,后又到长安,从鸠摩罗什受业。

竺道生学成后来到南京,被南朝宋文帝所倚重。后来他来到苏州虎丘山,为后来禅宗在南方的传播,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除虎丘山寺外,闲居寺也是苏州地区著名的寺庙。闲居寺的创立与发展,与高僧释僧业密不可分。

释僧业,俗姓王,河内人。曾游学长安,从鸠摩罗什受业。

当时鸠摩罗什等人方将《十诵律》译出,僧业专攻此书,鸠摩罗什称赞他为“后世之优波离”。

优波离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,可见鸠摩罗什对僧业佛学造诣的深许。

苏州士族张邵闻僧业之名,邀请他到苏州弘法,并为其建造闲居寺。此后,僧业一直居于闲居寺,直至441年逝世。



《江苏地方文化史·苏州卷》谈到了鸠摩罗什弟子们在江苏的故事



《南朝佛教与文学》提到,鸠摩罗什介绍过《摩诃婆罗多》

## 南京之行

### 泰戈尔的现实关怀

《往世书》,是印度古代梵语文学中一批神话传说作品的总称。

现存《往世书》数量很多,统称为18部大往世书和18部小往世书,实际情况可能更多。

书中天马行空的内容让人称奇,包括创世传说、天神和仙人传说、大神化身下凡传说、神魔斗争传说和圣地传说等。

相传,这些传说曾经深刻影响了诗人泰戈尔。

二十多岁时,泰戈尔的诗以浪漫为主,作品里充满诗情画意。



泰戈尔(中)、徐志摩(右)和林徽因

而他的戏剧和小说走的却是另一个方向,取材史诗和《往世书》,他把眼光转向现实。

关心现实、关心社会,是泰戈尔之后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趣味。

即使他在南京时,也不例外。

1924年,泰戈尔接受了梁启超、蔡元培的邀请,计划用6个星期与中国来一次“亲密接触”。在南京东大体育馆,他和学生们面对面,慷慨陈词了一个小时,说至激动处,紧握右手,放在胸前。

他说:“今世界障碍文化之恶魔势力如猛兽者甚多,排除责任,在于青年,排除方法,不在武器,当以道德势力,精神势力,相团结,发挥伟大之感化力,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。近世文明,转尚物质,并不为贵,亚洲民族,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,宜发扬而光大之,运用人类之灵魂,发展其想象力,于一切文化事业,为光明正大之组织,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,抑亦全世界之福也。”

作为翻译的徐志摩这样评价泰戈尔的这趟旅程:

“他这次来华,不为游历,不为政治,更不为私人的利益,他熬着高年,冒着病体,抛弃自身的事业,备尝行旅的辛苦,他究竟为的是什么?他做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。”

“说远一点,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。说近一点,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。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,他是尊崇青年的,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,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。”徐志摩说。



扫码关注  
江苏文脉公众号